

古代中外医药的交流互鉴

□ 陈景彪

我国传统医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世界科学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在古代的漫长发展历程中，祖国的传统医学既无私地对外广泛传播，又善于吸收外来的医药文化，使之相互渗透，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乃至人类的卫生保健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过境迁，当人类进入21世纪，遭遇新冠病毒肆意侵害时，祖国的传统医药再次与现代医学成功结合治疗传染性新冠肺炎，其疗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因而，传统中医学也被称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古代医药领先世界

早在石器时代，我国就有了医学萌芽。相传“伏羲制九针”，神农氏“尝百草”，黄帝播百谷草木，创医学。黄帝曾与岐伯、伯高等谈论医道，后世习称中医为“岐黄之术”。

千百年来，在与疾病的长期斗争中，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的中医药文化。如从春秋至秦汉三国时期，先后有《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四部经典中医药著作问世，确立了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学术体系和学术范式，奠定了中医学理论基础。特别是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对后世中医临床治疗影响深远，被誉为中医的灵魂；到隋唐鼎盛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医药百科全书——孙思邈所著《千金方》、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新修本草》。唐“太医署”是当时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医药学校；金元时期，出现以刘完素、张从正、李杲、朱震亨为代表的“金元四大家”，同源不同流，在病机理论和辨证施治等方面提出不同的学术主张，形成了学术争鸣；明代李时珍撰《本草纲目》，“编取神农以下诸家本草，荟粹成书，复者芟之，阙者补之，讹者纠之，凡一十六部，六十二类，一千八百八十二种”，筑起世界医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对我国和世界药理学及相关学科学术的发展贡献巨大。

明末崇祯十四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瘟疫流行，患者甚多，十户九死。医家吴有性深入疫区，潜心研究，

推究病源，终成《温疫论》，认为疫病由戾气引起，能从口鼻而入，明确提出“客邪贵乎早逐”，强调疫病贵在预防，并创制“三消饮”“达原饮”等方剂治疗。吴氏“温疫学说”早于欧洲200年创立和发展，是世界传染病医学史上一个伟大创举。清乾隆年代以后，温病学（温病是感受四时不同温热病毒所引起的多种急性病的总称，包含瘟疫）发展至鼎盛阶段，叶天士、薛雪、吴鞠通、王孟英等著名医家在继承吴有性温病学说的理论上，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温病学理论，使中医学面对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得到另辟蹊径的创新发展。

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和积淀，我国传统的中医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完善和成熟，成为理论体系完整、科目分类详细、实践经验丰富、诊疗效果显著的一门科学，在古代一直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传统中医学传播世界

由于我国古代医学在很早就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加之地理和文字的便利，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医学便通过高丽传到邪马台国（日本）。西汉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东汉时，班超再度出使西域，形成了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开辟了连接中国与中亚、西亚及地中海沿岸国家包括医药在内的文化商贸交流通道。

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医药对外传播兴盛起来。在这一时期，中医通过商贸、官方使节、留学生、佛教等途径传播到日本、朝鲜、印度、越南及东南亚、阿拉伯地区。如公元562年，吴人智聪携《明堂图》及医书前往日本，首次将针灸传入日本。唐代义净法师自述在印度生活了20年，不仅运用中国的医药治愈了自身的疾病，还为众多印度民众治病，传播医药知识。日本在隋唐时期，派遣许多留学生来中国学习，中国医学是“遣唐使”们学习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唐代鉴真大师精通医学，应邀东渡日本，带去大量医学书籍。在日十年期间，鉴真及其弟子讲经、授戒、看病、施药，毫无保留地将佛学五明之“医方明”理论和技术、中医学理论和技术传授给日本，并撰写了一部《鉴上人秘方》，为发展日本汉方医学

学作出重要贡献。鉴真不仅受到当时日本朝廷的嘉奖，还被日本医药界在14世纪以前奉为始祖。

辽宋夏金时期，我国与邻国的医药交流更加频繁。宋神宗元年，高丽王患病，遣使来宋朝请医，宋朝派翰林医官到高丽，并带去医药百余种。宋元时期，通过中东医圣阿维森纳所著的《医典》、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撰写的《马可波罗游记》等，中国医药知识被传播到阿拉伯和欧洲。阿拉伯商人还通过商贸将人参、茯苓、附子、朱砂、牛黄等60多种中药材转运到欧洲多国。明朝初年，郑和率庞大船队七下南洋和西洋，到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东非、红海，与沿途各国开展医学交流。

天花是有记载以来最古老的烈性传染病之一。在与天花长期不懈的斗争中，中国人发明了人痘接种术来抵御这一病毒，在生物学和病毒学尚未形成学科的时代，这种基于经验的干预术挽救了大量病患的生命。据成书于1741年的张琰所著《种痘新书》记载，人痘接种术使当时天花30%以上的病死率降到了2%以下。这是世界公认的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疫苗接种。17世纪60年代，人痘接种术通过希尔加西亚地区传至君士坦丁堡。有确切的记载称，1688年俄罗斯遣人到中国学痘症。此后百余年，人痘接种术传遍各大洲，为人类预防和控制天花流行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中外交通的进一步发达，我国的医书、药物、医术在清代传至朝鲜、越南、日本、印度、阿拉伯及欧洲多国。中医理论、药物、脉学、针灸等书籍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传播，促进了世界医学的进步和发展。

外来医药本土化

我国传统医药在不断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善于吸收外来医药文化，通过包容吸收，实现本土化，丰富和发展了本土医药学。我国开始接受外来药物的输入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而有确切文献记录的则始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从中亚多国带回了葡萄、红蓝花、胡桃、大蒜等可供药用的植物，开启了我国引进外来药物的历史。

从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佛教医方明经书相继被翻译为中文。同一时期，朝鲜和东南亚的药物和医术也不断传入中国，在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中，就分别收录了来自朝鲜的人参、五味子、昆布、细辛等味和来自东南亚的石硫磺、槟榔、白兔藿、犀角等药物。

隋唐五代时期，西域来华商人络绎不绝，带来不少当地产的药材。公元651—798年，每年从阿拉伯、波斯驶往中国贩卖香药等货物的船只达4000余艘。到五代时，甚至有以“沉香为山阜，蔷薇水、苏合油为江池，苓藿、丁香为林树，薰陆为城廓”的记载，来形容从波斯、大食等国传入的香药数量之巨。唐郑虔搜集西域等地传来的药物，撰写《胡本草》7卷；五代时，汉化波斯人李珣又著《海药本草》6卷，专门介绍外来药物。这两本书对我国本草学起到了重要的丰富作用。

宋元明清时期，随着航海技术的突破，中外药物海上交流更加频繁，尤以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使节进贡最为突出。外来药物在不同历史时期曾有“回回药”“番药”“胡药”等不同称谓。受阿拉伯医学的影响，药物制剂在宋代有了改进，出现了“丸衣”。元世祖忽必烈还设立了阿拉伯式医疗机构“广惠司”，采用阿拉伯医生和回回药给病人治病。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将新制刑法传入中国，结合中医药理论和药材，制成“花露”，不但用于治病，还用于卫生制剂流传至今。

回顾古代中外医药交流历史，不难发现，尽管各国医药来源背景不同，但依然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交融，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医药学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各个文明产生的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结合发展，必将携手造福人类。



（上接1版）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则是在新时代条件下，构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安全格局的方法引领。总体国家安全观讲究统筹，不能机械照搬，要有应势而动的灵活性，不能静止不变，要有因时而异的动态调整，一言以蔽之，就是遵循规律，善作善为，缺什么补什么。可以说，总体国家安全观将科学、辩证的方法论体现得淋漓尽致。

“总体”意味着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的完美结合。总体国家安全观饱含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体现在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国家安全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总体国家安全观由此阐明了我国国家安全的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的有机统一，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这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最大特色和关键内核。与此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和深切的人类情怀，总体国家安全观自诞生之日起就在“五对关系”中提出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在“十个坚持”里指明要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在“五个统筹”中再次提出要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共同安全的追求是一以贯之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同于一些国家追求绝对安全，将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割裂开来，因而具有世界意义。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

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作用，“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认识到，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

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一味退让只能换来得寸进尺的霸凌，委曲求全只能招致更为屈辱的境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引下，我们着力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战略体系 and 政策体系，建立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和应急管理机制。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加强国家安全教育宣传和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国家安全人民防线，推进兴边富民、稳边固边，严密防范和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顶住和反击外部极端打压遏制，开展涉港、涉台、涉疆、涉藏、涉海等斗争，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有效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科学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与“机”，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战胜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总体国家安全观彰显出前所未有的实践伟力。

总而言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安全思想理论演进和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安全领域的一系列理论突破和实践创举的系统总结，是既有系统性又有科学性、具备实践性兼有普世性的理论结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国家安全领域上的重大思想引领。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我们需要全面掌握和不断发展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个强大的理论武器，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不断赢取新的胜利！

（作者系总体国家安全观研究中心秘书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茶叶与英国的贸易逆差

贸易需求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和第一次全球化，但全球化开始以来，跨国贸易的纷争和冲突层出不穷。茶叶贸易在诸多重大事件中串演了关键角色，也是解读世界近代文明史的一条重要线索。

自从地理大发现之后，东西方的贸易越来越频繁，与美洲、非洲、印度等地相比，远东地区（中国、日本）有着强有力的政权，加之航路遥远，欧洲殖民者难以在远东设立殖民点，只能与封建王朝建立贸易关系。而封闭的农业帝国对外来贸易品的需求并不强烈，欧洲人只能将在美洲掠夺的金银送给东方王朝，来购买必须的瓷器、丝绸和茶叶。

中英茶叶贸易始于17世纪，早在1637年已有英国人在广州购买茶叶，但当时从荷兰或印尼购入仍是主流渠道。18世纪，中英茶叶直接贸易迅速发展，贸易规模扩大，到该世纪末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了华茶出口贸易垄断权，中英茶叶贸易进入了鸦片战争前的高峰期。

英国市场对中国茶叶的强烈需求和英国市场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排斥，造成了中英贸易间的巨额逆差。随着茶叶贸易额的不断增长，中英贸易逆差也居高不下，茶叶贸易成为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途径。同一时期，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对茶叶也有着巨大需求，而有国家背景的垄断企业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茶叶价格又偏高，于是走私茶叶行为泛滥。

进入19世纪后，英国由于率先完成工业化，有更多的产品如毛纺织品等需要销售来获利，然而远东的封建帝国只销出特产，并不吸纳“洋货”，中英之间形成巨大的贸易逆差。由于农业社会的保守性，除了鸦片外，其

他的工业品并不能进入中国市场，英国还是需要在中国源源不断地进口各类东方物产。对于东印度公司而言，1833年失去了印度的贸易垄断权，更是面临发展的危机。

对茶的需求到了依赖的程度，造成英国缺少白银进行交换。在这一背景下，东印度公司迫切地需要找到一个能够确保其基业长青的办法，英国首先想到的是打击中国茶叶生意。他们主要采取了两种办法，一个是移植中国茶叶，包括盗取一整套制茶技术；另一个是提高关税。

清廷“以茶制夷”的策略

英国为了解决对中国贸易的“入超”问题，选择了通过鸦片贸易来解决。白银的流失迫使英国寻找能够维系中英茶叶贸易的支付手段，鸦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登上中英贸易舞台的。而鸦片的出现虽然很快逆转了中英贸易的不对称局面，使白银开始回流，但却严重损害了中英关系，引发了中国的禁烟行动。清廷面对英国的贸易攻势，采取了“以茶制夷”的反制办法。

“以茶制夷”并不是新鲜事物，明朝就长期用这个办法对付游牧民族，大清朝这时候也觉得英国人只是另外一帮游牧民族罢了。当时中国人很相信茶叶大黄出口的作用，认为外国人

如果没有茶叶大黄以助消化，生命就有不保之虞。道光帝和林则徐都认为：停止英国贸易，牵涉到英国的国计民生，势必使英国政府答应断绝鸦片走私，中止武装挑衅，这样一来就不难达到永绝烟患、平安海疆的目的了。同时，林则徐还注意到了其他大臣没有注意到的茶叶细节，“大黄每年出口，本属有限，不过附搭药材项下。英夷所销尤少。唯茶叶在所必需，然有绿茶、黑茶之分，英夷所销多系黑茶，现在严密稽查，不使影射偷漏”。黑茶，这里是指红茶，英文把红茶翻译成“blacktea”。

1839年4月，当林则徐第一次到虎门布置收烟时，效果不佳，仅仅收到了5箱鸦片。可是到了第二天，林则徐提出以茶叶换鸦片的政策后，收到了烟土1150箱。之后收缴鸦片工作顺利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茶叶的奇效。用茶叶换鸦片的政策，最终让林则徐收缴到21306箱鸦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这一阶段，可谓大获全胜。但后来义律拒签永不来华售鸦片的保证书，并拒收朝廷赏给的茶叶，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茶叶大盗罗伯特·福琼

尽管在1830年英国人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开辟了茶叶种植园，但由

于没有掌握良好茶种和制茶方法，印度生产的茶叶质量大差，根本无法与中国所产的茶叶竞争。

为了在中国盗取茶种和制茶工艺，东印度公司找到了园艺师福琼。罗伯特·福琼是中国开埠之后，第一个到中国的英国园艺师。从1843年到1846年，福琼在中国各地跑了3年，到处搜集植物标本和种子，成为英国著名的中国通。

对于处在扩张阶段的大英帝国来说，收集寻找植物是寻找黄金的价值差不多——毕竟地理大发现的动力就是找到合适的香料，更别提工业革命之后能作为宝贵的生产原料，比如把橡胶种到东南亚、把甘蔗种到加勒比海，都给了大英帝国很多的发财机会。

1848年6月，担任伦敦切尔西皇家植物园园长的福琼带领着一队人马，登上了东印度公司的一艘快船。他们准备前往中国，盗窃当时全世界最具经济价值的植物样本——茶叶。9月份抵达香港，之后转到上海。在上海，他让雇佣的中国仆人们帮他剃光了头发，用马鬃编织出一条假辫子，穿上灰色的丝绸长褂，完全伪装成一个清朝人。他雇了一位姓王的“康白度”（即买办），通过陆路和水路交替到达杭州，在当地参观了绿茶加工厂，了解到绿茶的制作工艺。经过近一个月的水路行程，他们抵达“王某”在皖南的家中，在这里，福琼找

中国的记录——*A Journey to the Tea Countries of China*（《两访中国茶乡》），对自己的行为多有美化。7年之后，他又接受了美国专利局的聘请前来中国窃取茶种。这种盗窃行为，为他带来了巨额财富。

在福琼的领头下，英国人在印度阿萨姆和大吉岭创建茶叶公司，建立大型茶叶种植基地，并将印度茶叶标榜为“纯正茶叶”大肆吹捧，同时把中国茶叶冠以“毒茶”之名予以围剿，逐步逐出英国市场，并称中国茶叶是外国势力对英国的阴谋入侵。英国专家更把茶叶转化为智力殖民和英属印度农业的“纯正”化运动，公然宣称19世纪是英国开始书写茶叶历史的世纪，在强调茶饮为“英国价值”的象征的同时，也篡改历史，把茶叶的原产地改写成英国，茶园殖民地指南还规定了制茶的工艺。

福琼的偷盗行为给英国带来了福利，这样的行为在当时是被政府默认并鼓励的。但随着时间的演进，后人开始正视这段历史，在英国、在欧洲其他国家、在美国，都毫不避讳地把福琼称为“盗贼”。《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一书的作者萨拉·罗斯把福琼定位为“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时至今日，福琼的做法仍被定义为商业间谍活动，在人们看来，他的行为性质就跟偷走了可口可乐的配方一样”。

